增进对大国“三农”的制度性理解
——评罗必良教授的新作《大国三农》

黄祖辉

（浙江大学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 杭州，310058）

新中国成立 75 年以来，中国从一穷二白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国家的历史性转变，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制度内涵。以科斯、诺斯及阿西莫格鲁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制度和制度变迁是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原因。窥视我国由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向门类齐全工业化国家的转型历程，不同时期的制度建构及制度变迁发挥了重要作用。概括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制度安排主要是农业支持工业策略，核心是通过“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政策获得农业剩余，以促进工业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安排逐渐侧重工业反哺农业，核心是通过城市发展对农业、农村、农民渗透和带动促进共同富裕，形成了“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新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当前正处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和扎实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交汇期，从制度的角度解析中国农业农村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致力于回答两个方面的重大议题：第一是农业与国家形成，分析制度演化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二是农业与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探讨推动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罗必良教授所著的《大国三农：制度文化、行为机理与模式选择》一书，从制度与文化、行为与机理、模式与选择三方面对大国“三农”的关键性问题进行解析，恰好围绕上述两大议题展开。该书既剖析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接洽了大国“三农”情景中的具体问题，具有深厚的理论积淀与鲜明的现实导向。

在《大国三农》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1）大国农业的源起与延续。从谷物造就国家、双向驯化理解农业与国家，从发展模式思维转换理解农业与增长，从乡村治理转型理解乡土中国，进而明确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首要目标、中心任务与重点方向。（2）大国“三农”的制度与文化。本书揭示了由人地关系塑造的农地制度，由农业特性塑造的经营制度，由关系交易塑造的村落秩序，由稻麦种植塑造的南北文化，由历史记忆塑造的制度偏好，以及其中“双向驯化”的内在机理。（3）大国小农的行为与选择。本书揭示了由农地产权诱发的农民生育与教育行为，由人地关系诱发的劳动力迁移行为，由产权、配置与分工诱发的农户种粮行为，由人户分离引发的福利损伤与“逆城市化”现象，由破除收入神话而谋求生态福利等，都呈现了不同维度与层面的发展方式转型。可以说，“以人为中心”不仅是一种施政理念，而且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响应与农民的行为实践。（4）大国强农的模式与选择。本书由改造小农到服务小农总结出大国农业的“第三条道路”，由“关系型”到“契约型”交易转变重构村社治理的现代化逻辑，由大城市偏好到以县域为载体梳理大

作者简介：黄祖辉（1952—），男，上海人，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E-mail：zhhuang@zju.edu.cn

国小城的新型城镇化路径,由破除“收入神话”到解读“财富认同”梳理大国农民的共同富裕之路。

《大国三农》一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为读者勾勒了中国“三农”的轮廓,让读者同时了解到中国“三农”的现实表征和制度生成的内在逻辑。在我看来,该书的创新价值和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分析框架、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三方面。

一是逻辑完整的分析框架。《大国三农》一书通过构建“制度与文化—行为与机理—模式与选择”的理论框架,融合了农村制度、粮食安全、乡村治理等“三农”领域重要命题,可谓问题导向聚焦、逻辑链条完整、分析思路明确。第一部分“制度与文化”从地权制度,村庄形成,种植文化以及农户经历的角度,讨论影响以及规范农民行为的约束条件。第二部分“行为与机理”则是讨论在特定制度和文化的约束下,农民的诸多行为选择及内在逻辑。具体地,该书从生育与教育,劳动力非农转移等多个方面,全面讨论了转型时期农村劳动力的行为特征。第三部分“模式与选择”则是从农户行为变化所引起的大要素流动情景中,解析了农业生产方式、乡村社会契约、城镇化道路以及城乡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转型思路。总而言之,本书从制度形成入手、到讨论农户行为变化再到全面解析社会重构机理,该书所提供的较为完整的理论维度,能够深化对转型中的中国农业社会乃至整个乡土中国社会内在逻辑的理解。

二是以小见大的研究视角。本书从微观行为塑造宏观结构的视角出发,分析个体行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以及微观行为如何受到外在制度以及内在文化的影响。目前,国内对于农业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微观农户行为的刻画上,讨论在既定制度或者客观条件下,农户生产行为的特征。如农地确权与农地投资行为,农地确权和要素市场发育,抑或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关系等。而对于塑造农户行为的农地制度演化逻辑的讨论以及微观行为变化所引发的宏观社会转型的讨论则较少。《大国三农》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通过以小见大的研究视角提升了本书的理论深度。第一,从根源上寻找制度和文化的形成逻辑。从人地关系出发,讨论“均田”或者“均分”的制度形成;从稻麦种植文化的角度讨论南北农民的行为差异,尤其是从人力资本投资偏好解释南北的职业偏好分化;从饥荒经历讨论农民的制度偏好,解释家庭联产承包制的选择与存续。第二,思考微观农户行为变化对一系列后续宏观社会重构的影响。如城镇化背景下种植结构的变化,开放村庄的社会结构重塑和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转型等。正是这种以小见大的独特研究视角,以大国“三农”叙事的方式加深了本书对于农民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的理解,也强化了读者对于转型时期“三农”问题的深刻把握。

三是学科交叉的研究范式。多学科融合交叉的研究,有助于突破单一学科的局限,提高研究问题的精度与广度,对于中国“三农”问题的深化研究尤为必要。《大国三农》对此作了有益的尝试。尽管该著作主要是研究“三农”问题,但是除了采用农业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外,该研究还对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理论和知识作了交叉性的应用研究,这使得该研究不仅能够为农业经济学者所接受,而且也能与主流经济学界进行对话。此外,该书还涉及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以及农学等其他多个学科的观点、理论和知识,也有助于跨学科的沟通。该著作不仅采用计量经济学的实证方法,还采用了案例分析法。例如,对日本和美国农业发展进行多案例比较,由此讨论中国农业经营的可能性道路;对广东省茂名市浪山村的案例分析,则进一步说明村落的地权配置如何兼顾公平和效率,从而有助于深化对传统村落社会保障功能的认识。

罗必良教授是“三农”领域的著名学者,也是知名的制度经济学家,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我相信,《大国三农》一书有助于读懂“三农”中国、理解大国“三农”,是一部极具思想性、理论性和现实性的“三农”研究力作,不仅值得广大的“三农”研究者学习与借鉴,而且对于关注中国国情与发展的各界学者和朋友,也具有重要的参阅价值。